

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麦家 / 著

作家出版社

暗算

(未删节本)

麦
家／著

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暗算

（未删节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算/麦家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1

(2009. 3 重印)

ISBN 978 - 7 - 5063 - 4559 - 0

I. 暗… II. 麦…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1685 号

暗 算 (未删节本)

作者: 麦 家

责任编辑: 安 然

装帧设计: 曹全弘

版式设计: 吴 言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 net. cn

http://www. zuojia. net. 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80 千

印张: 17

插页: 3

印数: 30001 - 40000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559 - 0

定价: 23. 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序 曲	1
第一部 听风者	9
第二部 看风者	43
第三部 捕风者	205
后记三篇	261

序 曲

01

一个已经几十年不见的人，有一天，突然在大街上与你劈面相逢，或者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有一天，突然成了你的故交挚友，然后你的人生像水遇到了水，或者像水遇到了火，开始出现莫名的变化。我相信，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大家都有。我也有。坦率说，本书就源自我的一次奇特的邂逅。

02

说说我的这次邂逅很有意思。

那是12年前的事。12年前，我是个30岁还不到的嫩小子，在单位里干着很平常的工作，出门还没有坐飞机的待遇。不过，有一次，我们领导去北京给更大的领导汇报工作，本来，汇报内容是白纸黑字写好的，小领导一路上反复看，用心记，基本上已默记在心，不需我亦步亦趋。可临时，大领导更改了想听汇报的内容，小领导一下慌张起来，于是紧急要求我“飞”去，现场组织资料。我就这样第一次荣幸地登上了飞机。正如诗人说的：凭借着天空的力量，我没用两个小时就到达北京。小领导毕竟是小领导，他还亲自到机场来接我，当然不仅是出于礼仪，主要是想让我“尽快进入情况”。但是，我一出机场，刚一跟小领导见上面，二位公安同志蛮横地拦在我们中间，不问青红皂白，要求我跟他们“走一趟”。我问什么事，他们说去了就知道了，说着就推我走，把小领导急得比我还急！路上，小领导一个劲地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又何尝知道呢？这几乎可以肯定是一次神秘的“带走”，要不就是错误的。我反复跟“二位”申明我的名字，是麦子的麦，家庭的家，不是加法的加。其实，我父母给我取名麦家，首先是孤陋寡闻，不知世上有麦加圣城之说，其次是出于谦卑，也许是要求我谦卑吧。因为，麦家的意思，说白了就是田地的意思，耕作的意义，农民的意思，很朴素的。

话说回来，“二位”对我名字的是非，毫无兴致，他们说，管你是加法还是家庭，我们带的就是你，错不了的。听来像有点不讲理，其实全是理，因为有人是有鼻子有眼地指着我喊他们来带我的，哪会有错？那喊他们来带我的，也是两个人，在飞机上，我们坐在同一排，听他们私下交谈，

乡音不绝于耳，给我感觉是回到了自己远方老家。我也正是听着“两位”熟悉的乡音后，才主动与他们攀谈起来的。殊不知，这一谈，是引火烧身，引来了二位公安，把我当个坏人似的押走。

公安是机场的公安，他们是否有权扣押我，另当别论。这个问题很深奥，而且似乎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将如何脱身。公安把我和小领导一起引入他们办公室，办公室分里外两间，外间不大，我们一行四人进去后，显得更小。都坐定后，二位公安开始审问我，姓名、单位、家庭、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好似我的身份一下子变得可疑可究的。好在本人领导在场，再三“坚定又权威”地证明我不是社会闲杂人员，而是“遵纪守法”的国家干部。所以，相关的审问过去得还算利索。

接着，二位话锋一转，把问题都集中到“我在飞机上的所见所闻”之上，我一下子有点不知从何说起。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光荣坐飞机，“见闻”格外丰富、琐碎、芜杂，乱七八糟的，谁知道说什么呢？在我请求之下，二位开始有所指向地问我，其实，说来说去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在飞机上从两位“小老乡”的私谈中听到了些什么。这时候，我才有所觉悟，我邂逅的两位乡党可能不是寻常人物，而我的这次不寻常的经历跟我听到——关键是听懂——他们之私谈直接相干。他们认为满口家乡“鸟语”会令人充耳不闻，就如人无人之境，斗胆谈私说秘，不想“隔壁有耳”，听之闻之，一清二楚。

于是，心存不安。

于是，想“亡羊补牢”。

但是，说实话，我真的没从他们嘴里听到什么骇人听闻的东西，他们不是一开始就说家乡话的，我也不是那种“见人熟”，加上又是第一次坐飞机，好奇之余，又发现没什么好奇的，等飞机一拔上天，马上觉得无所事事，光傻瓜地坐着，自然戴起耳机看起电视来。我是在摘下耳机时才听到他们在说家乡话的，一听到，就跟见了爹妈似的，马上跟他们套亲近，哪知道他们在聊什么。我这样说似有狡辩之嫌，但是天知地知我知，我决非虚假。

事实上，想想看，如果我有什么不良企图，怎么可能主动跟他们认老乡？再说，既然我要认，又怎么可能听他们说了很久之后再认？再再说，既然我一听到就认，又怎么可能听到什么前因后果的？虽说口说无凭，但平心而论，我的说法——没听到他们说什么——不是不值得尊重的。我的

谆谆诱导没有枉费心机，又承蒙我领导极力美言，二位公安终于同意放我。不过，必须我保证一点：不管我听到什么，事关国家机密，何时何地都不得外传，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我自然是连连承诺，然后总算“一走了之”。

03

其实，又怎么能一走了之？

在以后的日子里，此事常如团异物，盘桓在我心头，令我神秘莫测又毛骨悚然。我不能想象，那两位乡党究竟是何等人物，有这般神秘的权威和秘密，连一句话都是听不得？我要说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但这样的“世面”没见过不说，而且打心里说，害怕见。离开公安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从口袋里摸出两位乡党留给我的名片，撕掉，丢入垃圾桶里。机场垃圾桶。不用说，这名片肯定是假的，所以也可以说，它们本来就是垃圾。我那么希望丢掉它们，意义不完全是为了丢垃圾，而是我希望通过丢掉这玩意儿，把两位乡党可能给我带来的麻烦统统变成垃圾，见鬼去。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是个平民百姓，是最怕出是非的。

但我又有种预感，他们还会找我。

果不其然，从北京回来不久，我就接到两位乡党的电话（我给他们的地址和电话都是真的），两人轮流在电话上向我解释、问候、致歉、安慰，还客气地邀请我去他们那边玩。说来，他们单位其实就在我们地区下属的一个县城附近，也许是在山里。我以前便听说过，那县上有个大单位，住在山沟里，很神秘的，他们进山之后，县里就没有一个人再进过山，包括原来在山里生活的山民，都举家迁居了。也正因如此，所以，没有人能说得清，这到底是个什么单位。说法倒是很多，有说是搞核武器的，有说是中央首长的行宫，有说是国家安全机构等等，莫衷一是。这样神秘的单位，有人请你去看看，一般人都是容易冲动的，我虽然心有余悸，依然不乏冲动。但却迟迟没有钱行，大概还是因为“心有余悸”吧。

然后是国庆节期间的一天，有人开车找到我家，说是有人要请我吃饭。我问是什么人？来人说是他们首长。我又问你们首长是谁？他说你去就知道了。这话跟机场公安说的一样，我马上敏感到可能是我的那两位神秘乡党。去了，果然如此，同时还有另外几个说着满口乡音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总共七八个。原来，这是老乡间的一次聚会，年年如此，已经

开展五六年，不同的是今年新增了我。

至此，可以说，我与本书已建立起一种源头关系，以后的事情都是水到渠成。

04

本书讲述的是特别单位701的故事。

“7”是个奇怪的数字，它的气质也许是黑的。黑色肯定不是个美丽的颜色，但肯定也不是世俗之色。它是一种沉重，一种隐秘，一种冲击，一种气愤，一种独立，一种神秘，一点玄想。据我所知，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一些担负着某些特殊使命的组织似乎都跟“7”有关，如英国的皇家七处，前东德的七局，法国总统的第七顾问，前苏联的克格勃系统的第七研究所，日本的731部队，美国的第七舰队等。说到中国，就是特别单位701，这是我国仿效前苏联克格勃第七研究所而组建的一个情报机构，其性质和任务都是“特别的”，下面有三个“特别的”的业务局：

侦听局

破译局

行动局

侦听局主要是负责技术侦听，破译局主要是搞密码破译，行动局当然就是行动，就是走出去搞谍报。侦听，就是听天外之音，无声之音，秘密之音；破译，就是解密，就是要释读天书，看懂无字之书；谍报，就是乔装打扮，深入虎穴，迎风而战。在系统内部，一般把搞侦听的人都称为“听风者”，搞密码破译的人叫做“看风者”，搞谍报的叫做“捕风者”。说到底，搞情报的人都是一群与风打交道的人，只是不同的部门，打交道的方式不同而已。

我的两位神秘乡党，其中一位是当时701的一号首长，姓钱，人们当面都喊他叫钱院长，背后则称钱老板；另一位是行动局的一名资深谍报人员，姓吕，早年曾在南京从事过我党地下工作，人称“老地瓜”，就是老地下的意思。两位都是“解放牌”的革命人物，年届花甲，在701，算得上是硕果仅存者。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与两位乡党关系渐深，使我有机会慢慢地演

变成701的特殊客人，可以上山去“走一走”。

山叫五指山，顾名思义，可以想见山的大致构造，像五个手指一样伸在大地上。自然有四条山沟。第一条山沟离县城最近，大约只有二三公里山路，出得山来，就是该县城关镇，一个依山傍山的小山城。这条山沟也是最宽敞的，701的家属院便建在此，院子里有医院、学校、商店、餐馆、招待所、运动场地等，几乎是一个小社会，里面的人员也是相对比较繁杂，进出也是不难的。我后来因为要写这本书，经常来采访，来了往往要在招待所住上几天，几回下来这里有很多人都认识我，因为我老戴墨镜（我自23岁起，右眼被一种叫强光敏感症的病纠缠，在正常的白炽灯光下都要戴墨镜保护），人都喊我叫墨镜记者。

后面三条山沟是越来越狭小，就进出的难度而言也是越来越大。我曾有幸三次去过第二条山沟，第三条山沟去过两次，而第四条，也就是最里面的山沟，一次都没去过。据说，那里是破译局的地盘，也是整个山上最秘密的地方。行动局是在第二条山沟里的右边，左边是培训中心，是个副局级单位；两个单位如一对翅膀一样依山而扎，呈扇形张开，但左边的扇形明显要比右边大。据说，行动局平时没几个人，他们的人大多“出门在外”。

第三条山沟里也有两个单位，一是侦听局，二是701机关，两个单位的分布不同于行动局与培训中心——面对面，相对而立，而是分一前一后，前为701机关，后为侦听局，中间地带带属双方共享，都为公用设施，如球场、食堂、卫生所等。

因为无乡民进得了山，山上的一切无人糟蹋，年复一年地，现在山上树木郁郁葱葱，鸟兽成群结队，驱车前往，路上经常可以看到飞禽走兽出没。路都是盘山公路，发黑的沥青路面，看上去挺不错的，只是过于狭窄，弯道又多，很考司机的手艺。据说，山体里还有直通的隧道，可以在几个单位之间快速来回。我第二次去侦听局时，曾提议钱院长是不是可以让我走一回隧道，老头子看我一眼，未予理睬，好像我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了。

也许吧。

不过，说真的，在我与包括院长在内的701人的接触过程中，我明显感觉到，他们对我的心态是比较复杂的，表面上是害怕我接近他们，骨子里又似乎希望我接近。很难想象，如果只有害怕，我这本书将如何完成。肯定完成不了的。

好在还有“希望”。

当然，更好在每年还有“解密日”这个特殊的日子。

05

我要说，作为一个特别单位，701的特殊性几乎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有些特别你简直想都想不到，比如它一年中有个特殊的日子，系统内部的人都管它叫“解密日”。

我们知道701人的工作是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的，但职业本身具有的严密保密性却使他们自己失去了甚至是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以致连收发一封信的自由都没有，都要经过组织审查，审查合格方可投递或交付本人阅读。这就是说，若你给他们去信，主人能否看到，要取决于你在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如果你的言谈稍有某种嫌疑，主人便可能无缘一睹。退一步说，即便有缘一睹，也仅是一睹而已，因为信看过后将由组织统一存档保管，个人是无权留存的。再说，如果退回二十年，你有幸收到他们发出的信（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比较小，除非你是他们直系亲人），也许会奇怪他们为什么会用复写纸写信。其实，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他们投出的信件组织上必须留下副本；在尚无复印设备的年代里，要让一份东西生出副本，最好的办法无疑是依靠复写纸。更不可思议的是，在他们离开单位时，所有文字性的东西，包括他们平时记的日记，都必须上交，由单位档案部门统一代管，直到有一天这些文字具备的密度消失殆尽，方可归还本人。

这一天，就是他们的“解密日”。

这是一个让昔日的机密大白天下的日子。

这个日子不是从来就有，而是起始于1994年，即我邂逅两位乡党后的第三年。这一年是钱院长离任的年头，也是我初步有写作此书打算的年头。由此不难想见，我写作此书不是因于结识两位乡党，而是因于有幸迎来了701历史上未有的“解密日”。因为有解密日，我才有权进山，去山沟里走走，看看。因为有解密日，701人，严格说是获得解密的人，才有资格接受我的采访。

不用说，若没有解密日，便不可能有此书。

06

我的身份无关紧要，我说过，这里人都喊我叫墨镜记者。我的名字叫麦家，这我也是说过的。我还说过，生活中，邂逅一个人，或者邂逅一件事，这是常有的事。我认为，有的邂逅只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一种形态，一种经历，一点趣味而已，并不会给你的生活创造或带来什么特殊的不同，但有的邂逅却可能从根本上把你改变了。现在，我忧郁地觉得，我与两位乡党的邂逅，属于后一种，即把我从根本上改变了。现在的我，以写作为乐，为荣，为苦，为父母，为孩子，为一切。我不觉得这是好的，但我没办法。因为，这是我的命运，我无法选择。

至于本书，我预感它可能是一本不错的书，秘密，神奇，性感，陌生；既有古典的情怀，又有现代的风雅，还有一点命运的辛酸和无奈。遗憾的是，最支持我写此书的人钱院长已经去世，无缘一睹此书的出版。他的死，让我感到生命是那么不真实，就像爱情一样，昨天还是好好的，今天就完蛋了，鸡飞蛋打，什么都没有了，生变成了死，爱变成了恨，有变成了无。如果说，此书的出版能够给他的亡灵带去一点安慰，那即是我此刻最大的愿望。

此书谨献给钱院长并全体701人！

第一部 听风者

怀揣着首长恩赐的特别通行证，我的秘密之行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善待和礼遇，几乎在任何环节上我都可以做到心想事成，并被人刮目相看。只有一样东西无视了我，那就是不通人性的运气。是的，我有神秘的通行证，但没有神秘的运气。

第1章 瞎子阿炳

瞎子阿炳的故事就是我的两位乡党之一钱院长，讲给我听的。这也是我听到的关于701故事的第一个。讲这个故事时，院长还是院长。就是说，他是在离任前给我讲这个故事的，当然还是“密中之人”。再说，那时候也还没有“解密日”之说；即使现在，他依然还没有列入解密的名单中。根据以往惯例，701头号人物的解密时间一般是在离职后的十年左右，如果以此计，那么也要到明年才是他的解密时间。所以，有关他的故事，我所知甚少，有所知也不敢妄言。这不是胆大胆小的问题，而是常识问题。人在常识面前犯错误，不叫胆大，而是愚蠢。

那么，他何以敢在解密日颁布之前私自将阿炳故事诉之我？我思忖，大概他在当时已经知道即将有解密日之事，而且阿炳的事情必在头批解密的名单中。事实也是。这就所谓艺高胆大，他是位高胆大——站得高，看得远。他时驾701众生之上，比他人先知早觉一些内情秘事，实属正常。但以我之见，这不会是他急匆匆给我讲阿炳故事的决定理由，决定理由也许是没有的，倒是有两个可以想见的理由：一个，他是阿炳故事最直接的知情人，自然是最权威的讲述者；二，我怀疑他对自己的命数充满不祥之疑虑，担心某一天会说走就走，所以便有“早说为妙”之心计。他后来果然是“说走就走”，夜里还好好好的，还在跟人打电话，说往事，一觉睡下去，却永远瞑目不醒。现在，我重述着他留下的故事，有种通灵的感觉。

下面是老人的口述实录——

01

我去世已久的父母不知道，我以前和现在的妻子，还有我三个女儿包

括女婿，他们也都不知道，我是特别单位701的人。这是我的秘密。但首先是国家的秘密。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秘密，秘密的机构，秘密的武器，秘密的人物，秘密的……我是说，有说不完的秘密。很难想象，一个国家要没有秘密，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也许就不会存在了，就像那些冰山，如果没有了隐匿在水面下的那部分，它们还能独立存在吗？有时候我想，一个秘密对自己亲人隐瞒长达几十年甚至一辈子，是不公平的。但如果不这样我的国家就有可能不存在，起码有不存在的危险，不公平似乎也只有让它不公平了。

秘密不等于见不得人。在我秘密的一生中，我从没有干过见不得人的事，我的单位你知道，它不是什么恐怖组织，而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机构，主要担负无线电窃听和破译任务。要说这类机构任何国家和军队都有，所以它的秘密存在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真正秘密的是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人员编制、工作手段及困难和成果等等，这些东西打死我也不会说的。它们比我生命更重要。

在我们701，大家把像阿炳这样的人，搞侦听的人，叫“听风者”，他们是靠耳朵吃饭的，耳朵是他们的武器，也是他们的饭碗，也是他们的故事。不用说，作为一个从事窃听工作的专业机构，701聚集了众多在听觉方面有特别才能的人，他们可以听到常人听不到的天外之音，并且能够识别声音中常人无法识别的细微差别。所以，他们的耳朵常常被人誉为“顺风耳”。顺风耳是跟着风走的，风到哪里，他们的听觉就跟到哪里，无音不闻，无所不知。然而，那一年，那一阵子，我们一双双顺风耳都被对方捂住了，一个个听风者都成了有耳无闻的聋子。

事情是这样的，这年春季，由我们负责窃听的X国军方师旅级以上单位的无线电突然静默了52个小时。这么大范围，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电台，无一例外地处于静默，这在世界无线电通讯史上是创下纪录的。如果说这是出于战略需要，那么这种军事谋略也是破天荒的，与其说是军事谋略，倒不如说是疯狂行为。想想看，这52个时辰不定会发生多少的天下大事？什么天下大事都可能发生！所以说，对方的这一招绝对是疯狂透顶的。

然而，他们这次耍疯狂的结果是当了个大赢家，52个小时静静地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是第一赢，可以说赢的是运气。还有第二赢，赢的却都是我们的血本。就在这52个小时期间，他们把师旅级以上单位的通讯设备、上下联络的频率、时间、呼号等等，统统变了个翻天。这说明什

么？说明我们偷偷摸摸十多年来苦苦积攒起来的全部侦听资料、经验和手段、技术等等，一夜间全给洗白了，等于了零。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甩得远远的，一时间，我们所有人员、技术、设备等都形同虚设，用我们行话说那叫：701瞎眼了。

想想看，在那个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的年代里，这有多么可怕！

02

事情层层上报，最后上面传达下来一句话：我们不喜欢打仗，但更不喜欢被动挨打。

这意思很明确，就是必须改变这种局面。

然而，要指望701在短时间内改变局面显然是不可能的，迫不得已，总部只好紧急起用地面特工，即行动局的人。但这样获取情报的风险太大，而且截取的情报相当有限，只能是权宜之计。要彻底改变局面，除了让侦听员把失踪的敌台找回来，没有第二个办法。为尽快找到失踪的敌台，701临时成立了一个办公室，专门负责四方奔走，招贤纳士。办公室由701头号人物安在天院长亲自挂帅，侦听局吴局长直接领导，下面有七个成员。我就是成员之一，当时在侦听局二处当处长。

在总部的协助下，我们很快从兄弟单位抽调了28名专家能人，组成了一支“特别行动小组”，每天在茫茫的无线电海洋里，苦苦搜索，寻觅失踪的敌台。我们的努力是双倍的，但收获并不喜人，甚至令人十分担忧。特别行动小组，加上我们原有的侦听员，××，每天24小时忙碌，一个星期下来，却仅仅在45个频率上听到了敌台的声音，而且都是转眼即逝的。

要知道，军用电台不像民用广播，后者使用的频率是不变的，而前者使用的频率少说是一天三变：上午一套频率，下午一套，夜间一套；三天为一个周期。这就是说，一个最低密度的军用电台，至少有九套频率（3套3天）。一般的电台通常有15或21套频率，个别特殊电台，它变频的周期有可能长达一个月，甚至一年，甚至没有周期，永远都不会重复使用频率。

据我们了解，对方师旅级以上单位至少有100部电台在工作。换句话说，我们至少要侦听到他们100部电台的声音，才能比较全面地掌握敌情，好让高层做出正确的战略部署。如果一部电台以平均18套频率计算，那么 $100 \times 18 = 1800$ 套频率。而现在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仅仅找到了45套频率，

只有最起码要求的2.5%。以此类推，我们少说需要25个星期，即将近半年时间，才能重新建立正常的侦听秩序。而总部给我们的极限时间只有三个月。

很显然，我们面临的现实十分严峻！

03

说来奇怪，虽然同在一个院子，他是大领导，我是小领导，要说应该是有接触交往的。但就是没有，怪得很。我是说，以前我还没有正面地接触过我们院长——铁院长，只是不经意地碰到过几次，点头之交，认识而已，给我印象是个子很高，块头很大，长相很英俊，但对人很冷漠，老是板着脸，不苟言笑的，像个已淡出绿林的武士。单位里的人都害怕他，怕他沉默中的爆发，有人甚至因此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地雷”，意思是碰不得的。这一天，我正在打电话，他突然气冲冲地来到我们办公室，进门二话不说横到我面前，抢过了我手上的话筒，狠狠骂道：

“我从半小时前就开始给你们打电话，一直占线，说，你在打什么电话，如果不是工作电话，我就撤掉你的职务。”

好在有吴局长作证，我打的是工作电话，而且就是联系侦听员的事，无可指责，否则我这个处长就只有去天上飘了。由此可见，“地雷头头”真正是名不虚传啊。

平静下来后，首长（铁院长）对我们招贤纳才的工作提出质疑，认为我们老是在“圈子内”挑来选去，收罗到的或正在收罗的只是优秀的侦听员而已，而701现在更需要在听觉方面有过人之处的怪才，偏才，甚至天才。他建议我们打开思路，走出圈子，到社会上或者民间去寻找我们需要的奇人怪才。

问题是去哪里找这样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找到这样的人要比找到失踪的电台还要困难。

首长对我们提这种无理要求，让人感到他似乎已经有些失去理智。其实不然。其实他已打探到这样一个人，此人姓罗，曾经是国民党中央乐团的专职调音师，据说还给宋美龄调过钢琴，后者十分赏识他，曾亲笔赠他三个字：罗三耳。解放前，在南京，罗三耳的名字总是和蒋夫人连在一起，甚至还有些绯闻传出。解放后，他改名叫罗山，移居上海，当时是上海音